

# 从《唐史发潜》看张唐英的君道观与臣道观

黎 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4年12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2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月22日

## 摘 要

《唐史发潜》是北宋学者张唐英的史论著作,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臣道政治思想。前人多关注《唐史发潜》的史论价值, 但对其中的政治思想关注较少。《唐史发潜》中对于唐代君主以及大臣的评价也是对张唐英的君道、臣道政治思想的总结。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 即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影响, 提倡“圣君贤相”, 张唐英独特之处在于他擅长将隐藏于历史之中的恶人恶事或者嘉言懿行揭发出来, 除了揭发臣子的恶行还敢于大胆批评君主, 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历史之教化作用。

## 关键词

《唐史发潜》, 张唐英, 君道观, 臣道观

## On Zhang Tangying's Views on the Way of a Monarch and the Way of a Minister as Seen from *Tangshi Faqian*

Fei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10<sup>th</sup>, 2024; accepted: Dec. 30<sup>th</sup>, 2024; published: Jan. 22<sup>nd</sup>, 2025

## Abstract

*Tangshi Faqian* is a historical work b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 Zhang Tangying, 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political ideas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Predecesso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angshi Faqian*, but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ideology in it. The evaluation of the monarchs and minister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angshi Faqian* is also a summary of Zhang Tangying's political thoughts on the way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Zhang Tangying's concept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has both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side,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oncept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advocating “sage king and prime virtuous minister”, Zhang Tangying’s uniqueness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is good at exposing the evil deeds of evil people hidden in history or good words and deeds, in addition to exposing the evil deeds of courtiers, he also dares to boldly criticize the monarch, and it is also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history in education.

## Keywords

*Tangshi Faqian, Zhang Tangying, The Way of a Monarch, The Way of a Ministe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张唐英，北宋时期学者，四川新津人。元修《宋史》誉其为“有史才” [1]。史称张唐英著作颇丰，其历史评论著作《唐史发潜》主要内容包括对唐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唐史发潜》此书现已散佚，现存篇目仅见于《历代明贤确论》中的 52 篇，本文采用近代学者傅增湘整理收录的《宋代蜀文辑存》中的 52 篇史论来探究。前人多关注《唐史发潜》的史论价值，但对其中的政治思想关注较少。《唐史发潜》中体现出的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即是其政治思想之一，也是此文需要探讨的内容。

北宋中期，西夏、辽常与宋爆发战争，而宋多败，加上国内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诸多学者纷纷举起效法《春秋》的大旗，于是形成一个唐史研究的高潮，将史学的作用投入到现实中。张唐英史论的目的在于“发潜”，即客观评价隐藏于历史之中的恶人恶事与忠言逆耳，将他们发掘出来，否则便会埋没忠烈之名，而使恶人青史留名，这不能发挥历史之教化作用。

## 2. 《唐史发潜》中的君道观

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君王御统天下，对君主的评价也是反应张唐英对政治的敏感度，儒家学者一般用褒贬之说来评价君主，符合为君之道和擅长驾驭臣下的君主值得推崇和借鉴。张唐英的君道观就体现在《唐史发潜》中所议论之具体人物以及所围绕其发生的政治事件中。

### 2.1. 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的史论围绕为君、为臣之道展开。在为君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得君之体等，这都是通过人君的道德修养来完成的，君王御统天下，品性修养极其重要。提高个人修养向来被宋代学者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2] 君主修行品行向来受到儒家学者的推崇。

《唐史发潜》中的史论涉及历任唐代君王，张唐英在对唐高祖的评价中强调人君的道德修养在于君主需仁义，不可以私待臣。从杀刘文静却释裴寂的处理可以看出唐高祖性格偏私，专断，张唐英《刘文静论》评价唐高祖是“喜裴寂私昵之爱，而恨文静形之于言，故仇之酷也” ([3], p. 347)。裴寂、刘文静跟随高祖唱难起义，及高祖登极，而裴寂赏赐无极，文静待遇却不厚。刘文静开国功臣最后却因为多几句怨言以谋反罪杀害，张唐英强烈倡导后世君主应以此为戒，否则迟早失去人心。

张唐英认为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反对天命迷信论。张唐英在《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中质疑武则天天命：“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亦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读史至此，

未尝不疑也……以愚观之，有舜禹汤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言，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 ([3], p. 355)张唐英反对不以仁义之道取天下，而以假符瑞以惑天下。反复强调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在《德宗责御史段平仲论》中指出德宗器量狭隘。德宗失君人之体，《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4]为君者对于臣下应当优柔温怡，否则臣子畏惧不敢言，自此不通下情。段平仲进言，德宗声色俱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误称名，于是坐废七年。德宗即位，一开始便展露雄才英气，希望能做到中兴，可从他的行为和对臣子的态度来看还是不够的。段平仲因为小事被废，对其他臣子来说更加不敢进言。对比太宗于程名振奏事，见名振词色不屈，于是优而任之，而德宗却相反，由此可见，“德宗之量，岂不愧于文皇哉” ([3], p. 366)。

以上便是《唐史发潜》对唐高祖，武则天，唐德宗等唐代君王的批评，唐高祖以私待臣，武则天以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唐德宗气量狭小，这都被张唐英从历史之中发掘出来。人君需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治国以德行为重，只有太宗文皇这般人，这才是他心中的圣君。

## 2.2. 驾驭臣下，赏罚分明

君主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即得驾驭之道。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唐太宗如何驾驭群臣：“文皇帝驾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则固有之；至于君臣上下之分，岂有渎乱者哉？” ([3], p. 374)唐治之盛，实由太宗始。

失驾驭之道的君王，终致天下离乱。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明皇如何失驾驭之道。天宝中，安禄山来朝，玄宗宠信非常，甚至在大殿之西偏设一鸡帐，给安禄山安排一个特殊的位置。太子劝谏安禄山不应该受到过度宠信，玄宗不听。“安禄山胡人，不识中原仁义礼仪之训” ([3], p. 350)，安禄山来朝，玄宗不明以君臣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礼，反而待以家人之礼，禄山逐渐自大而欲图不轨。

张唐英从太宗、玄宗驾驭人臣的对比中，突出太宗能驾驭臣下，主要因为他赏罚分明。而玄宗赏罚不明，宠信安禄山过甚，以致禄山自大而欲图不轨，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 2.3. 善纳贤者之谏

张唐英在《玄宗德宗不用张九龄姜公辅之言论》中强调玄宗、德宗被谗言所蔽，不纳贤者之谏，最终流落“幸蜀”而悔不当初([3], p. 375)。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上奏表示安禄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玄宗不但不听还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将张九龄罢免。

德宗时，朱泚之弟朱滔在幽州造反，派人送密信给朱泚，结果泄露，朱泚求情，德宗于是解除朱泚的职务，将他安置在长安。姜公辅看出朱泚已失兵柄，心有怨恨，提议不如趁机除掉，德宗不能决断。朱泚很快在泾原为帝，进逼奉天，意图杀死唐德宗，最后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张唐英认为德宗信任朱泚也不愿听从姜公辅的谏言，果然导致朱泚之乱而后悔不已。

从《资治通鉴》中德宗与陆贽的对话来看，德宗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推诚待人才导致决策失误。德宗曰：“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 [5]德宗并不信任谏官，也不认为他们的话有所帮助，他认为这些谏官总喜欢自行夸耀，对了就是自己的功劳，错了就推开保存名声。德宗只要一问难，下面的人马上便无话对答。德宗对待臣下进言时不够宽容，只知以威严震慑臣下，于是久而久之，言路闭塞。

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贤相之言不听从，只听从谄媚之言，安史之乱后逃至四川，才悔不当初。德宗之才，原本可进中主而上，但德宗好疑太过，缺乏对臣子的信任。张唐英认为君主做不到善纳贤者之谏，就不能择善而从，最后过错没有及时修正，导致决策失误，遗祸不已。

## 2.4. 君主治国唯在择宰相

张唐英在《朋党论》中评价唐代的朋党之争，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宰相选择得当，所谓得

贤相于是天下治；宰相所用非人，则天下容易乱([3], p. 370)。当时唐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李宗闵引牛僧孺为相，去李德裕之党。李德裕复相后，就排挤李宗闵。宗闵于是勾结驸马、女学士再求入相。等到李训、郑注用事，又启用李宗闵，李德裕被排挤。文宗虽然有嫉恶如仇的斗志，但却缺乏果断的能力，最后朋党相倾，无有虚日。无论是李宗闵还是李德裕当上宰相，都专注于内部争权夺势，张唐英敏锐地看到唐朝皇帝此时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制止不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越发衰落。如果唐朝皇帝择良相，加强对官僚的控制，那么朋党之争很难发展壮大。

### 3. 《唐史发潜》中的臣道观

北宋中期，战争频繁加上国内出现各种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士大夫主体忧患意识加强，对现实多发表见解。五代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伦理混乱，到了宋朝为臣的要求也不断加深。张唐英《唐史发潜》中的刘仁轨篇有言“夫臣子之道，勤劳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让所以全美，朴厚所以任事”([3], p. 355)，这充分体现了张唐英的臣道观，忠孝、直臣、庸臣、贤臣、正臣、贼臣、小人等等具体评论，符合其贬恶扬善的主题。

#### 3.1. 忠于君主

在为臣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臣者，忠于君主，贤能正直之臣得到大力赞赏，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探寻出所谓“忠臣”与“奸臣”。忠是古代政治家对为官者的基本政治要求。忠，就是指官员要忠于君主、社稷，而实质就是忠于君主[6]。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寻出不显于世的“忠臣”，为他们抱不平，例如高君雅揭露唐高祖起兵反隋，结果反被以勾结突厥而污杀。张唐英赞扬此是“隋之忠臣”，应当表彰。而唐代史官为避讳却隐瞒事实，张唐英认为这不利于劝人从善，《高君雅论》：“然而史臣不载其辞者，盖为唐而讳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于世。”([3], p. 348)张唐英对高君雅的评价体现他对“忠臣”的看法，若高君雅稍有权力，岂不能一奋而报隋？隐瞒其忠义之举，实在是阻碍“忠烈之道”。

此外，张唐英从李敬业起兵以勤王救国、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这一目的出发去评价李敬业，发掘出被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这一“忠臣”。李勤孙敬业，在武则天临朝时起兵于扬州，以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他的谋士骆宾王还撰写《讨武曌檄》号召天下，不过中途转为攻打南京图谋不轨而败。李敬业兵败逃往润州，为部下所杀。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李敬业论》却认为自古以来有志之士成功了大家才极尽赞美，不成功则不值得称颂，“若敬业不能称‘忠’，则后世无为旧君效命者”([3], p. 358)。

张唐英评价萧瑀是忠直之臣，萧瑀虽沉迷佛教甚至想要出家为僧，《萧瑀论》：“然尽忠于隋，及归国亦多有功绩，颇见委任。”([3], p. 353)萧瑀原是隋之外戚，萧瑀有才但由于性格不讨喜被炀帝疏离，后投降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内史令，萧瑀孜孜尽力，处理大小庶政。从萧瑀的经历来看，对隋朝尽忠，归国亦多有功绩，完全称得上“忠直之臣”。

对于“不忠”的臣子，张唐英的标准却提高了。例如李光弼，张唐英在《李光弼论》中认为此绝非“纯臣”([3], p. 365)。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李光弼本与郭子仪齐名，晚年为宦官所谗，拥兵不朝，声名受损，因此愧恨成疾而去世。张唐英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

由此可见，张唐英认为的“忠臣”，即便是高君雅，许敬业等史学不加赞美的臣子，张唐英也认为需从细节中探寻，将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事迹发扬出来。对于李光弼的看法，张唐英却严厉许多，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依然有“不忠”的事实。

#### 3.2. 勇于上谏

在《苏世长论》《郑公言守成之难论》《岑长倩论》《陈子昂论》中，勇于上谏的臣子值得赞扬。苏



世长长于谏诤，得讽谏之道。天下之君，穷奢极侈，不念创业之艰难，惟见守成之容易，天下败乱继踵，率皆由此。《苏世长论》中唐高祖建立华丽的披香殿，苏世长向唐高祖谏诤：“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长曰：“昔陛下居于武功之时，宅才庇风雨，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初有天下，于隋宫室又加雕饰，其可得乎？”（[3], p. 348）

张唐英《魏郑公论》用魏征之口劝诫君王守成更难，应当警惕富贵之后而骄奢忘本，府库殷实后不思来之不易，“志气既骄，则悦谄谀之言；嗜欲既惑，则恶忠直之谏”（[3], p. 351），不听劝诫，最终天下已叛，而堂上未闻。

苏世长和魏征都是劝诫唐朝统治者天下安定后不应穷奢极侈，这是臣子辅翼人主之道之一。正直者，公平无私，不逢迎权贵不屈从强暴，不媚时俗，不附和，对合乎道理的事要实话实说，不口是心非，谏官都应有此等品质。

岑长倩看似顺从武则天的心意，实际上为了社稷。则天革命后，岑长倩上疏请改皇嗣姓武，却反对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作为周室太子。岑长倩表面顺从，实际是为了保存李唐皇室。时人多批评岑长倩请改皇嗣之姓此事，而张唐英在《岑长倩论》中认为长倩之心乃陈平顺吕后之心，惜乎人不明其心（[3], p. 357）。

议论者认为陈子昂作《大周受命神凤颂》是为了取悦武则天，这是不忠于唐的事实。张唐英《陈子昂论》：“士君子仕于乱世，以此微文而全身远害者可也。”（[3], p. 359）陈子昂表面讽谏武后实为保佑中宗。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官员。陈子昂屡次上书谏诤，言论切直，虽常不被采纳，但这也冒着不小的风险。所以说陈子昂讽谏武后，非谄媚也，此是直谏之臣。

### 3.3. 公正去私

自古以来，公正去私就是为官者最应当看重的美德，张唐英强调为官者需公正去私，为官处事如果有偏袒，就是因为自己有私心。《论语》说：“公则悦。”为政以公才能得到人心悦服。张唐英《李林甫置节度论》认为李林甫置节度乃是出于私心，欲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于是任用藩将充任节度使。李林甫是皇室宗亲，以恩庇入职，无儒术文行才望而妒忌贤能有才之人，为了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启用不识文字，不懂朝政之边将为节度使，张唐英认为“故禄山之叛，由专范阳大将之任，故敢西向，欲争天下，此皆由林甫启之也”（[3], p. 363）。李林甫结交宦官与武惠妃，于是对玄宗的事无不了解，每次奏对，常使玄宗称心，由是擢黄门侍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政绩可观，玄宗欲为之加官进爵，甚至提升为尚书，张九龄以无此先例，恐朝廷不服以为不可。而李林甫在此时暗中进言：“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引得深得玄宗大悦，最后牛仙客得到大量赏赐。最终张九龄罢相，牛仙客被任命为尚书后只会唯唯诺诺，于是政务皆由李林甫做主。张九龄贤臣也，为政以公，李林甫却只知讨好皇帝以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

《李揆论》中提到肃宗时期李揆陷害吕諲一事。李揆与吕諲同为宰相，吕諲才居李揆之上，吕諲以事出守荆南，由于政绩出彩于是再入为相。李揆妒忌他不希望他再入朝得以重用，于是秘密派人到江陵求吕諲之事，想添油加醋好中伤污蔑吕諲，后来此事暴露，李揆于是贬为袁州刺史。真是“欲陷他人，乃自陷也”（[3], p. 364）。辅翼人主当泽天下，李揆奈何以自己的私心攻击同僚，破坏朝廷公正。

张唐英在《王翊召朱泚之乱论》中评价王翊犒军不知国家致远之道而惜毫毛之利，岂能知此哉？世人皆知朱泚之乱，却不知召朱泚者王翊也，张唐英从历史的线索中将王翊这一祸害之行揭露出来。朝廷大臣以及后宫权势没有功绩却极尽享乐，而普通士兵三餐饮露，衣不蔽体，如果没有重赏和重罚，他们不会甘心卖命。王翊犒军不知体恤还亏待士兵，于是引发动乱，《王翊召朱泚之乱论》有言：“而翊惜一饭之费，流四海之祸，卒使狂荡窃发，污辱庙社，渎乱神器，腥秽天地，祸害生灵，非翊召之，而孰召之

耶？”([3], p. 371)王翊犒军严苛,此非公正之为,惜毫毛之利而误苍生。臣子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等各个方面需做到公正去私,不然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张唐英也批评李德裕,李德裕认为朝廷要官当任世家子弟,因为世家出身更知典故。张唐英从李德裕的家世分析,李德裕祖父李栖筠,父亲李吉甫皆为高官,自己又是宰相,提出这种建议岂不是为了家族利益?张唐英的《李德裕请任世家为要官论》认为李德裕之言是“私于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3], p. 371)。

总之,张唐英认为臣子之道在于勤劳以立功,忠恕以立名,退让以全美,朴厚以任事。臣子为政则需做到公正去私,辅佐君王则需勇于上谏,这是张唐英臣道观的全部。

#### 4.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都是评价唐代君臣,其中可以体现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的一面,敢于大胆批评君主,不把君王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唐英撰写此书时目的在于挾伐昏君奸臣,于是他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又是其独特之处。

##### 4.1.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

受制于时代背景,宋代学者大多受义理之学的影响,即突出儒学中的伦理纲常、道德名教,文章多强调道德教化的一面。张唐英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出发,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提高个人修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君主应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君主应善纳贤者之谏,择善而从;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为臣者,需忠于君主,为人做事应贤能正直,勇于上谏,处理政务需公正去私。这不仅是对君与臣双方提高个人修养的要求,也体现其对君与臣之间良性的互动的要求,君待臣以仁德,臣待君以忠义;君主善纳谏,臣子勇于上谏;君主治国在于择良相,臣子则需贤能正直,公正去私。这种良性的互动才能真正构建起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

宋代的义理史学家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发表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7]。从《唐史发潜》评价内容来看,个人的立场、观点十分强烈,这也体现了张唐英这一宋代学者的自觉。张唐英撰写《唐史发潜》的目的本就是以唐代历史来“发潜”,即揭露唐代历史的真相。张唐英君道观的根源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继承传统儒学对君主的要求,也就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来的“圣君贤相”的终极标准。其次,张唐英在对君道观的论述中,希望通过批判部分唐代君主,给宋代君主以借鉴,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之良策。张唐英强调君主治国需以德行为重,推行仁政,相对应的臣子则需忠于君主,直言敢谏,公正去私。对于正史所不见的忠义之举,张唐英不仅赞扬高君雅,李建业等是“忠臣”,还同情窦建德的遭遇。除此之外,张唐英对唐代大臣态度十分鲜明,他着重于从历史细节找出忠臣贤臣,对于不忠不公正的臣子则大加批判。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不仅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儒学思想,更为了发扬其贬恶扬善的主题,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张唐英所提倡的君臣观不仅给宋代君臣提供以借鉴,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价值。

##### 4.2.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局限

史论本身具有较强主观性,从《唐史发潜》中可以看出张唐英对人物的评价主要为了揭露历史真相,所以不完美的君臣全会被列出,但这样会导致其评价视角也比较片面,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只强调其中某一点则难免会不够全面。例如在评价李光弼时,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

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甚至以王忠嗣、郭子仪对比李光弼。《大事记续编》作者王祜就认为张唐英此说法片面，浅显。王祜曰：“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而归宿卫，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以忠嗣、子仪而观光弼之识，浅矣。” [8]

张唐英评价人物与事件虽然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有些议论也受限于作者的想法与认知。张唐英评价李光弼仅仅从将李光弼与王忠嗣、郭子仪对比就得出“臣子不忠”的结论，却未分析李光弼所处时境，的确不太全面。又如李敬业起兵，中途却图谋不轨妄图南京。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却从动机出发认为李敬业依然是忠臣，这显然是为了标新立异。文章只重道德教化难免会使其评价人物时变得不那么客观，这也是许多宋代学者的通病。

## 5. 结语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以唐代政治内容尤其是君臣之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目的评论是从宏观视角出发的通论，这充分反映了张唐英《唐史论断》论史的全面性，本文从中截取最能体现张唐英君臣观的一些内容加以总结。《唐史发潜》虽以唐代的人物，事件为主，从此中也可反映出张唐英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唐代的历史作为借鉴，从而使史学真正为现实服务。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即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影响。又有其大胆的创见，张唐英敢于挾伐昏君奸臣，评价人物的视角也是别具一格，即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

## 参考文献

- [1] 脱脱, 等. 宋史(卷三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1099.
- [2] 郑训佐, 靳永.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87.
- [3] 博增湘, 原辑, 吴洪泽, 补辑.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十二)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4] 周振甫. 诗经译注(卷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8.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7354.
- [6] 杨建祥. 中国古代官德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5.
- [7] 汤勤福. 义理史学发微[J]. 史学史研究, 2009(1): 42-49.
- [8] 王祜. 大事记续编(卷六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51.